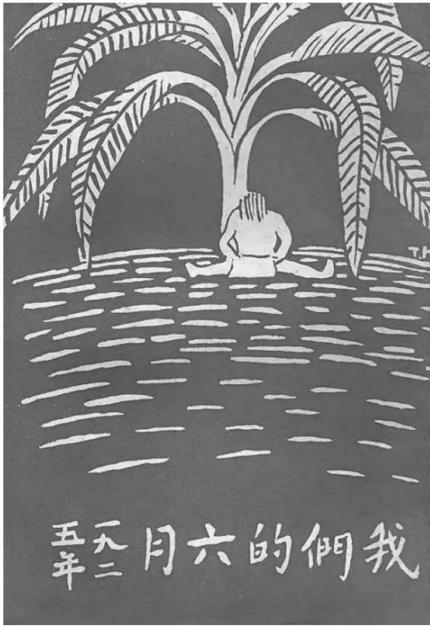


“我们社”诞生记

朱惠民



丰子恺设计的《我们的七月》封面



丰子恺设计的《我们的六月》封面

1924年至1925年，五四之子朱自清在宁波省立四中(今宁波中学)与上虞春晖中学执教时，组建了新文学社团“我们社”，其社刊《我们》编于浙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我们》只出了两期：《我们的七月》(1924年)与《我们的六月》(1925年)。“我们社”的出现，标志着浙江新文学运动开始脱离早先混沌状态，而由核心人物引领，且对文学的本质与功能作出启蒙主义体认，认为文学革新就是破晓的晨钟，从而进入了人的“觉醒年代”。

菜花初开时诞生

浙江有两家五四新文学社团，凑巧都发端于油菜花黄时。一家是湖畔诗社，成立于1922年；一家是“我们社”，成立于1924年。湖畔诗社的标志是薄薄的一本诗集《湖畔》，书封的上半部是春意盎然的湖畔，画面标上黑体“湖畔”两字，在下角则书“1924年油菜花黄时”七号楷体，格外悦目。读着那“油菜花黄时”墨绿色字样，不由得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学导师朱自清，是他来到浙江一师，造就了张维祺、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等湖畔诗人。两年后，朱自清来宁波奉化和上虞教书，在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创建了“我们社”。“我们社”之名来自于《我们的七月》与《我们的六月》两本杂志，师友和朋辈集合于现代传媒下一起发声乃至呼喊，成就了一个文学流派。

1924年初春，正是油菜花初开之时，俞平伯和朱自清与刘延陵、丰子恺等商议建社办刊事宜。俞平伯说：“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谈《我们》的用稿。”俞平伯描写了当时白马湖春天的意象：“浙东一带风俗原比较淳朴，青山绿水，黄的菜花，更称耐了这平和的仙境的氛围。”“春晖校址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朱自清也写道：“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五青青春之力的推动，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诞生了“我们社”。

形成文学流派

“我们社”的成名从根本上说，主要是这群作家能够拔戟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得到世人的关注。“我们社”成立不久，俞平伯于4月出版了他第二部新诗集《西还》，书衣为西湖夜景，似是水彩画，为画家洪野所作，书名作者自题。7月《我们》第一辑问世，封面由丰子恺设计，7月的田野、雨后的霓虹、丰茂的草丛、飘逸的柳叶合成一首抒情曲。第二年也即1925年6月，《我们》第二辑面世，封面但见一个人坐在树下埋头阅读，只用了一种绿色，弥漫着意境之美。其第一辑也只用了一种蓝色，丰子恺常用色彩，笔墨单纯，然而历经近百年，仍无陈旧之感。

同年11月，俞平伯和叶圣陶合著的《剑鞘》出版，书名为叶圣陶手笔，装饰画是丰子恺画的，用了棕色。12月，朱自清《踪迹》出版，也是由丰子恺设计封面。封面图案是海浪，海空中有两只海鸥，天上由小至大的圆圈。虽然无可名状，却引人遐思：这踪迹是什么？是否有“我们社”同仁的踪影？

这一大堆创作成果，标志着“我们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这是一群“同志集合”，虽然他们非有意立派，却以其厚重的业绩，自立于五四新文学之林。

当年，俞平伯由杭州出发，先赴上海拜访了叶圣陶(当时叶家门口挂着文学研究会的牌子)，就成立“我们社”事征询了叶圣陶的意见。叶圣陶是建社的积极参与者，他为社刊《我们》贡献了文稿，还是一名称职的“副主编”。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关系·文学论争集》(1935年10月出版)导言即有明白表述：“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在上海创办《诗》杂志及《我们》。”清华大学图

书馆至今仍珍藏着由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联合签名的《我们的七月》。朱自清当年给俞平伯的信函中记载：《我们的六月》拟署作者之名，“圣不以为然”。拟用插画《黄昏》《三等车窗内》，“圣谓此两幅可用。”“圣来信云对女子装饰有些意见，我将去信，请他即成一文，以付《我们》。”

“我们社”的发刊宗旨

“我们社”活动时期，叶圣陶和俞平伯还于11月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剑鞘》，书中叶圣陶的《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菀菜》皆是五四散文中出类拔萃的佳作。所获佳评如潮：“他写散文文体，温和谦冲，既不像那些追求‘美文’作者的华丽，也不像那些模仿晚明散文家那样过分的洒脱。”(夏志清)“一见便知道是一个斫轮老手笔下写出来的，这实在是散文中最高的典范，创作中最正当的规范。”(苏雪林)

书中最精彩的，要数《读者的话》与《诗的泉源》两文。《读者的话》借读者之口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写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而不是旁的人的……我不希望你们说人家说烂了的应酬话，我不希望你们说不曾弄清楚的勉强话，我更不希望你们全不由己纯受暗示而说这样那样的话……

我又要求你们的工作能使我的心动一动，就是细微，像秋雨的滴入倦容的怀里也就好了；能使我尝到一点滋味，就是淡薄，像水洒沾上渴者的舌端也就好了；能使我受到一点感觉，就是轻浅，像小而薄

的指爪在背上搔着也就好了。这样，我就满足了所以要读你们的东西的愿望。

这显然也是“我们社”及《我们》的发刊旨要。这两段话像一把金钥匙，凭着它，能探知“我们社”同道散文创作些许秘诀。其一，创作要表现自我，为我立言，抒我之情，载我之志。自己的主张，“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要说出自己的话。这与朱自清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刊于《我们的六月》)中提出的写作为“心的旅行”说(即意在“自我表现”)似为同调。这在当时可谓一种先锋的创作理念，新文学先驱者们以这种理念指引着星荒期散文前进的脚步。其二，表现手法要让人感动，哪怕是细微、淡薄、轻浅，其抒写都要有“艺术的闲谈”的风采神韵。

《诗的泉源》说：“唯有充实的生活是汨汨无尽的泉源。有了源，就有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这席话，可谓一部“诗美学”的缩影。“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故诗、文艺离不开人生，离不开社会，更离不开人民。“我们社”的同道们对于“诗的源泉是生活”的诗作理念颇为一致。朱自清当时直抒：“我们现在需要最切切的，自然是血与泪的文学，是呼吁与诅咒的文学。”叶圣陶认为：“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富。”俞平伯也以为：“《诗的泉源》这篇短文的论点和风格，就叶圣陶来说，也可以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作者为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研究员。本文拟入编于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资料)

许德珩并非“教育部督学”，只是视察团成员

祝西恒的学生、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原委员孙恭顺在《祝西恒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及了此次活动。文中说：“1944年许德珩任教育部督学时，持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致祝西恒的信函，到川康兴业公司技术室同祝西恒会晤，目的是要西恒师与其一起去西南各高等学院视察教学情况。”与上述史料对照，作者的回忆在细节上与事实略有出入。

由于该文涉及到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在早期的活动，在社史研究领域经常被引用，有必要加以说明。

一是视察活动并非发生在1944年，而是1945年上半年；二是许德珩所任并非教育部督学，而是视察团团员。

当时的教育部督学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的正式官员，任职条件较为严格、委任程序较为规范，任命时一般会有教育部的公文对外发布。如1931年8月颁布的《教育部督学规程》规定：“教育部设督学4人至6人，负责视察及指导全国教育；督学由有简任或荐任文官资格、曾任教育职务两年以上者充任。”

1945年上半年的这次视察中，只有“团长”黄龙先是教育部督学，而许德珩等4人是团员，并非教育部督学。

文人轶事

梁启超有个学生叫李任夫，他在《那时的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回忆，1923年，梁启超50岁生日那天，在北京某女校作过一次重要演讲，题目是《知命与努力》。在梁启超一生的众多演讲中，融合亲身经历和人生体悟的并不多。梁启超前半生奔走呼号，鼓吹共和新民，后又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世事沧桑，白云苍狗，又恰值五十岁生日，难免大发感慨，他举起右手指着一堵墙说：

人生五十，是一生的里程碑，所以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孔子从几十年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所谓天命是什么呢？绝不是八字先生所谓的命，而是通过自己躬行力践认识到的一个道理。譬如我前面的那扇墙，我今天就想努力把它推倒，是不可能的，努力是要的，但在看清楚客观环境之后，明白了自己主观上纵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今天不可能把这扇墙推倒了，这即所谓天命。换句话说，天下事物都有个分际，有个限度，我们

文人轶事

20世纪20年代，剧作家陈梦韶根据著名小说《红楼梦》编写话剧《绛花洞主》第四幕“戏谑”时，对《红楼梦》第20回中的一句话不甚明白。原话是史湘云戏谑林黛玉的：“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呀，厄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其中，“爱呀，厄的去”究竟是什么意思，陈梦韶查了许多《红楼梦》的批注本，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解答。

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当讲到《红楼梦》时，陈梦韶便向鲁迅提出了这个问题。鲁迅沉思片刻，作了这样一番解释：这是史湘云打趣林黛玉的玩笑。史湘云咬舌，谐音不准确，叫贾宝玉“二哥哥”，变成“爱哥哥”。林黛玉打趣她说：“倘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

文人轶事

洪深是清代诗人、人口学家洪亮吉之后，中国著名的话剧和电影艺术家，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第一个提出“话剧”一词。

洪深思想先进，非常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在学校时，经常与学校附近的贫民交朋友，由于他设架子，所以贫民们都乐意和他交谈，这也为他早年创作较为成熟的文学剧本《贫民惨剧》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洪深非常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对他们非常同情，总想为他们写点什么，有一次，洪深碰到一个拉驴挣钱的小女孩，问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挣钱了？你怎么不读书呢？小女孩睁着天真的大眼睛说：“先生们读书是为了做官，而我们穷人要让读书，全家都得饿死。”小女孩的话，让洪深非常吃惊，读书，全家就要饿死，只有小小年纪出来挣钱，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

这让洪深思考一个问题：富人读

文人轶事

1929年夏天，占领济南的日军撤走，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教高中国文的4位老师是清一色上海来的青年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和董每敏。前两位是季羨林的业师，对季羨林的影响很大。那时候国文课本已经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经学课被取消，作文也改为白话文，学生们感到很新鲜。董秋芳出的作文题目很特别，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意思很明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季羨林从小喜欢看闲书，后来看了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几乎都读遍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好文章，一要感情真挚、充沛，二要词句简短、优美、生动，三要布局紧凑、浑然一体，三者缺一不可。

有一次写作文，在董秋芳“随便写来”的启发下，季羨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为父亲送葬的作文。作文簿下发

梁启超五十谈天命

秦千里

所谓努力，只能在这个分际和限度之内去活动。

李任夫回忆，梁启超越说越激动。可是出乎意料，他的口才赶不上他的文才。在行文上他可以做到下笔万言，得心应手。然而在讲演上，他却做不到口若悬河。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梁启超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能富，也不能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五十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我虽然尽了几十年的努力，不过为各位做个开路先锋而已。”

梁启超一番感叹唏嘘，在李任夫看来，当时的精神风貌已比不得戊戌政变前后那样朝气蓬勃了。这也许就是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的原因吧。

鲁迅巧释咬舌语

周惠斌

哥”地叫，明天赶围棋，又要把‘么二三’说成‘么爱三’了。”湘云受黛玉这样打趣，也来个反打趣，笑着对黛玉说：“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愿明后天，得一个咬舌子林姐夫，做你的好伴儿。那时候，你时时刻刻会听到他叫你：‘唉呀，我的妻！’”谢天谢地，那时才活现在我的眼里！”经鲁迅先生这样一番详细解释，陈梦韶一下子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不久，陈梦韶根据鲁迅先生所作的解释，修改了剧本第四幕。1927年1月14日，鲁迅特意撰写了《绛花洞主·小引》，先是对《红楼梦》的主题解读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文末则对陈梦韶的话剧剧本《绛花洞主》作了高度评价：“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但佩服作者者的善于情节，妙于剪裁。灯下读完，僭为短引云尔。”

洪深创作《贫民惨剧》

刘兴尧

书，有文化，然后出来做官，做官欺压和剥削穷人；穷人没钱，读不起书，没有文化，世世代代穷下去，接受富人的压迫和欺负。这样下去，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洪深想起了听说过一个民谣：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刺。说的是土匪来扫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洪深想起了听说过一个民谣：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刺。说的是土匪来扫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洪深想起了听说过一个民谣：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刺。说的是土匪来扫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洪深当时是大学老师，学校里也有一些同情穷人的老师，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办一所专供穷人读书的小学，但是开办学需要资金，就想起来演戏募捐，这样，创作剧本的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到了洪深的头上，于是，洪深就创作了五幕话剧《贫民惨剧》。

季羨林的文学恩师董秋芳

崔鹤同

来的时候，看到他在每页的空白处，董老师写了不少批注，他大吃一惊。有的地方批道“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老师却注意到了，而且一语道破。“知我者，董先生也！”受到董老师的鼓励，季羨林非常高兴。

在另一篇作文后面，董秋芳批道：“季羨林的作文，同理科班的王珉榜一样，大概可以说是全班之冠，也是全校之冠吧。”季羨林本来就爱好作文，受到老师如此褒奖，他的写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开始创作散文。他的作文《文明人的公理》和《观剧》《西伯利亚》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翻译的外国作家和诗人的几篇作品也刊登在济南《国民新闻》上。作品连连见诸报章，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大家。

虽然后来季羨林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不相关，但他对散文创作情有独钟，终生乐此不疲，最终成了一位散文名家。每忆及此，季羨林就满怀深情地说，这“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九三学社成立前一次教育视察活动

纪习尚

九三学社成立于1946年5月4日，在此之前，创始成员如许德珩、黄国璋、祝西恒等就已开始开展一些活动。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活动中，成员间构筑了信任、增加了友谊，为以后创建九三学社打下了基础。

高教视察团主要由后来的九三学社成员组成

1945年5月23日，成都出版的《燕京新闻》头版以《教育部高教视察团连日在蓉工作甚忙》为题，记录了九三学社成立前，成员间较早的一次集体活动。原文如下：

教育部高等教育视察团一行五人，由简任督学黄龙先率领，已于

本月初渝渝抵蓉。据该团团员、参政会驻会委员许德珩所谈视察任务，旨在详细调查各大学教授学生实际生活情况。故该团以来，并非为普通督学性质，而含有拜访慰问之意。按该团团员除黄许两氏外，尚有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国璋，医教会委员戴天佑，川康兴业公司总工程师祝西恒三氏。

视察团的人员组成，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由于此次视察兼具督学和慰问两个目的，成员也有粗略的分工：戴天佑时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为教育部内部人士，黄国璋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是知名的学者，他们更多的是承担“督学”部分的职责；许德珩时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访问高校师生、了解他们的意见想法属于他的履职范围，此行的职责偏重“拜访慰问”；祝西恒是四川本地人，长期从

事实业发展，熟悉地方情况，有他的沟通协调，视察活动会顺利很多。按《燕京新闻》的说法“该团组成分子，包括各方面人才，故注意范围也比较广泛。关于各大学现行课程、教授及学生生活状况等，将有极详尽之考察。”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视察的4位团员，许德珩、祝西恒、黄国璋、戴天佑等后来都成为了九三学社社员，其中许德珩、祝西恒、黄国璋3人是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而戴天佑是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这并非偶然，爱国知识分子们在国统区走到一起创建民主政团，相互间的了解、信任、友谊非常重要，而共同的活动也进一步增进了这种互信。许德珩等人便以此为契机，与西南地区高校的教授学者们有了比较广泛的交流，客观上对后来九三学社的创建是有帮助的。